

四川大学『N二工程』子项目
中国区域历史与文化
晚清民国四川学术文化系列

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

张忠著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 / 张忠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6

ISBN 978-7-80752-812-8

I. 民… II. ①张… III. ①出版事业—文化史—成都市
—民国 IV. ①G239.27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6538 号

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

MIN'GUO SHI'QI CHENGDU CHUBANYE YANJIU

张 忠 著

责任编辑	陈亚玲
封面设计	经典记忆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028) 87427333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8.5
字 数	2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812-8
定 价	1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总序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动之期，亦是中国学术向现代性转型之季。四川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边远地区，无论社会变迁，还是学术文化转型都具有鲜明的特点。

四川学术转型与尊经书院的创办和发展关系甚为密切。1875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所设课程为经、史、小学、辞章，其中尤重经学。1879年，四川总督丁宝桢聘请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担任书院山长，主讲春秋“公羊”学。书院曾把学生在经、史、辞章方面的优秀文章刻为《蜀秀集》，后又将《尊经书院一、二、三集》刊刻印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尊经书院开始由主通古学转向传授“新学”，增设天文、舆地、中外交涉、商务、测算等现代科目；还创办了《蜀学报》，鼓吹西学。后几经变更，书院成为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其中的许多著名学者，如廖平、宋育仁、谢无量、吴之英、张澜等都曾入长或执教于四川大学及其前身各校。这一转变堪称是四川学术转型的主流。

20世纪20年代以降，祝曾同、何鲁之、叶秉诚、束世澂、丁山、柳诒徵、萧公权、伍非百、吴虞、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胡鉴民、蒙思明、刘咸炘、缪钺、李思纯、任乃强、吴天墀等名家先后

活跃于四川学坛。这批学者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学术更急剧地向现代性转型之季。他们的经历与学源差别极大，有留学西洋者，有来自中心区域者，也有纯属川中地方学者，在新学旧学变换之中所持观点异趣互见。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又都处在从旧学向新学过渡的过程之中。来自中心区域的徐中舒先生和留学归国的李思纯先生等已大体走上现代科学史学的道路。但更多学者如蒙文通、刘咸炘等却与廖平等相似，皆由经学而新学，既与古学有剪不断的联系，又受时代的影响而不同程度地涉足新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风貌，为中国古学向现代性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掘这一区域性学术转型的进程、成就和特征，是全面考察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晚清民国四川学术丛书》拟逐个研究此间四川有代表性学者的学术渊源、学术成就与学术特点，以图较充分地展示晚清民国时期四川学术转型的历史形态。

编 者

2006年10月30日

序

本书是张忠副教授在其博士论文《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其出版填补了四川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可喜可贺！

近代出版物是传承文化之一重要“载体”，对近代文化的传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往往决定着文化传播的内容、方式以及受众的范围，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对成都出版业的生产、流通、管理，以及这些“载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都应纳入文化史的范畴加以讨论。出版史作为以历史上的出版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史，是历史学与出版学和编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的范围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出版业内部各方面的联系，二是出版业与社会的互动，譬如出版活动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育的联系与影响等等。

近年来，各国关于出版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西方学者极为关注此一论域，哈贝马斯在研究“公共领域”时，就注意到期刊等出版物在构建“公共领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安德森在探讨“想象的共同体”崛起的原因时，特别阐释了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法国学者戴仁开创性地研究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新西兰学者叶宋曼

瑛对商务印书馆的早期领导人张元济进行了专题研究；美国学者芮哲非详细研究了1876—1937年间上海印刷业的发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国内学者对出版史研究的兴趣也日趋浓厚。同样以商务印书馆为例，近年来，学者除了对张元济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外，还探讨了商务印书馆后期的领军人物——王云五在该企业重建以及发展历程中的巨大作用，并对其作出了较为公正和全面的评价。另外，有学者从文化知识传播的社会功能这一视角考察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揭示出商务印书馆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关系；还有学者探讨了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的互动关系，高度评价商务印书馆对推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甚至有学者将商务印书馆与《新青年》、北京大学相提并论，称之为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大重镇。正是在出版史研究日趋转热的氛围中，本书正式付梓，可谓应运而生。

本书为张忠的第一部殚精竭虑之作，如下数端，值得一书：

其一，本书是填补四川出版史研究空白的作品。自西学东渐以来，近代中国出版业最发达的地区属东南沿海地带，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自然亦集中于这一繁华之区。相对于东南沿海地区，偏居西南边陲的四川的现代化的转型起步较晚，发展相对缓慢。这一历史特点不仅决定川省相对较多地保留了一些传统因素，也致使四川文化及其载体出版物与出版业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因此四川出版业具有重要的，甚至可说更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本书对民国时期成都的出版业进行了细致地梳理，重建了成都出版业发展的史实，可称得上是四川出版史研究的力作。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西南区域史尤其是西南区域文化史的研究。

其二，本书是一部有助于深化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著述。成都出版业最繁盛之期为抗战时期。其时，国府西迁重庆，东部大量人口和企业也随之西迁，成都的出版业一度呈现了反常的畸形繁荣。当时成都

图书、杂志、报纸供不应求，出版企业竞相创办，促进了成都出版业的迅速发展。本书用相当大部分的笔墨描述了战时成都出版业的发展样态，揭示出成都出版业和抗战的紧密关系，从一个侧面丰富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其三，本书是一部治学态度严谨、史料翔实之作。史学研究历来以史料为生命线，“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否则研究即为无源之水。本书作者在史料搜集上颇有功夫。与其他出版史的专著不同，本书在参阅大量同时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大量地征引了珍藏于四川省档案馆和成都市档案馆的民国档案资料，为提升本书的学术价值发挥了关键作用。民国期间的出版业是一种经营较为分散的行业，因此档案中对成都出版业的记载十分凌乱。作者在阅读大量档案的基础之上，对相关档案材料进行了细致的整理，爬梳剔掘，条分缕析，基本理清了民国成都出版业的轮廓。由于拥有大量资料支撑，本书可谓文章未写“半句空”。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缺点，有待于作者以后加以改进。由于作者十分注重于史实的重建，着力于出版业内部各种因素的梳理，而对成都出版业与当时经济、教育、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则略显单薄。这是作者今后从事类似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之处。

张忠 2004 年考入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谦称基础不厚，需笨鸟先飞。且言而有信，潜心向学，三年苦读，进步颇为显著。其博士论文经改编成书出版，确是心血凝聚之果。“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张忠再接再厉，不懈耕耘，在史学研究领域中奋力进取，做出更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陈廷湘

2011 年 4 月 30 日于四川大学

目 录

总 序·····	(1)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成都古代和近代早期的出版业·····	(22)
一 中国印刷术的发源地·····	(23)
二 繁荣一时的五代十国、两宋出版·····	(29)
三 元气渐复的明清出版·····	(39)
四 重放异彩的近代早期出版·····	(48)
第二章 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的发展状况·····	(70)
一 发展原因及背景·····	(70)
二 成都出版业沿革·····	(86)
三 “木书业”的数量分布及分析·····	(96)
四 近代出版企业的兴起·····	(101)
五 近代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印刷企业的发展·····	(114)
六 近代图书发行企业的崛起·····	(124)
第三章 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的经营·····	(133)

一 近代“木书业”的出版活动·····	(133)
二 近代出版企业的经营·····	(138)
三 近代印刷企业的经营·····	(152)
四 近代图书发行企业的经营·····	(162)
第四章 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的自治组织·····	(180)
一 出版业的同业公会组织·····	(180)
二 出版业工人的职业工会·····	(192)
第五章 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的监管·····	(216)
一 监管的法规·····	(216)
二 早期的监管机构·····	(224)
三 抗战时期的监管机构·····	(229)
四 解放战争时期的监管机构·····	(244)
结 语·····	(246)
参考文献·····	(250)
后 记·····	(260)

绪 论

—

四川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物华天宝，人文荟萃。公元前140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建石室，设学堂，为我国地方官办学校的创始之举。文翁派蜀人子弟到京师学习中原文化，于是蜀学“比于齐鲁”，作为蜀学重镇的成都，由此成为西汉著名的文化中心。在汉代，汉赋四大家中有两位为成都人——司马相如和扬雄^①，他们留下了不少堪称千古绝唱的名篇。其后，蜀人喜文弄墨蔚然成风，延至三国不辍，据《三国志》记载，向朗“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论古文，不干时事，以是见称”^②。在此风的熏陶之下，蜀人佳作接连不断，先有譙周著《古史考》，为订补《史记》阙误的精审之作；后有譙周的弟子陈寿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继有东晋常璩写成《华阳国志》一书，至今仍

① 郭付人、谭继和、冯定川、何一民主编《成都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319页。

②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10页。

为研究四川古代史之重要参考资料，此一时期的四川可谓文运兴盛。

四川的锦文华章或许就是四川出版业繁盛的一个驱动力。据史书记载，中国引以为荣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就诞生于唐代的成都（另一说是诞生于成都和扬州）。唐代以降，四川一直与浙江、福建交相辉映，被誉为中国古代出版业的三大中心，三地雕印的书籍有“蜀本”、“浙本”、“建本”之美誉，驰名天下。三地出版的书籍各有千秋，人们评论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①，其中成都印制的一些“蜀本”书籍在版本学上具有异常珍贵的价值。

步入近代，中国的出版业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文明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入中国。一些新成立的出版企业改弦更张，争相采用西方印刷术，建立各种各样的公司，中国传统的出版业面貌焕然一新。此种出版业的“新陈代谢”，带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变化，就是上海、广州等一些得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城市，后来居上，成为新型出版业中心，成都等一些传统出版业中心辉煌不再。但传统往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会立刻就中断。成都作为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出版业中心，在民国时期其出版业虽不能与上海等大城市相提并论，但仍保持相当的规模，并且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既有采用西方新式印刷技术的股份有限公司，又有持久不衰的传统雕版印刷，还有古色古香的古旧书业；并且成立了制度完备的各种同业公会和职业工会，以及专职的出版业监管机构，这使得民国时期成都的出版业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从中国出版史的研究状况来看，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学者们对中国古代的出版活动非常关注，从清末的叶德辉、缪荃荪到现代的孙毓修、陈登原及稍近的张秀民、李致忠等学者，几乎对历朝历代的刊刻

①（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活动都进行了细致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古代出版史的研究显得较为深入。相比而言，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研究尚显浮浅，其研究多集中在东南沿海的上海、广州等地和北平、武汉等大城市；研究对象多以闻名全国的商务、中华、开明、世界等大型出版企业以及生活、读书等激进书店为主；同时兼顾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秘密或半公开的出版企业。近年来，对一些解放区和根据地的出版业也略有涉及，一些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版事业也逐渐被纳入研究范围。但总的来说，研究还不够深入，浮光掠影式的研究不少，尤其是对偏居西南内陆的传统出版业中心——成都的整体研究，目前还无人涉足。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此项研究的开展，能开拓区域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从而为整个民国史的研究提供参考材料。

另一方面，对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的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成都出版业最鼎盛的时期集中在抗战时期。在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八年抗战中，尽管成都的出版业遭遇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但其从业者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出版了大量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书刊及表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舍生忘死、抵御外侮的优秀作品，对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坚持抗战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同时，他们也出版了大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籍，使我国和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能够在战火硝烟中得以传播、积累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战时读者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血肉横飞的战争是令人痛苦的，但同时也可能带来机遇。抗战期间成都的出版业正是捕捉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聚集了各种有利因素，从而获得了迅猛发展。因此，可以说成都出版业的发展与抗战密不可分。抗战结束后，成都的出版业急转直下，一蹶不振，与战时形成了鲜明对照，足见抗战对成都出版业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抗战时期成都出版业的深入研究，全面梳理抗战与成都

出版业的关系，以期进一步加深对抗日战争的理解。

近年来，学界对抗战时期重庆和桂林出版事业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这毫不奇怪。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理所当然成为战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书贾辐辏，引人注目；桂林作为闻名全国的战时“文化城”，名人云集，文化发达，其出版业自然易于受到学界关注。相比之下，成都的出版业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可是，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成都，其出版业发展虽显畸形，但在某些方面一度超越桂林，成为仅次于重庆的出版业中心。然而有关的研究远不能令人满意。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尚无此方面的研究专著，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希望通过拙著的耕耘对此有所补救。

二

本研究无疑应属于中国近代区域出版史。研究伊始，首先要对中国出版史的概念有一个清晰明了的认识。令人遗憾的是，出版史的研究尽管已经持续百余年，但研究水平还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出版史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来看，较早从事出版史研究的王益、张召奎、宋原放、李白坚等诸位先生，明显地受到了日本著名书志学家弥吉光长的影响。弥吉光长认为，出版史应包括如下八个方面的内容：（1）书志及书志性的出版史；（2）出版社史及个人传记；（3）出版团体史；（4）出版司法及行政史；（5）出版流通史；（6）著述、编纂史；（7）印刷、装订及纸业史；（8）读书、藏书史^①。这个观点在早期的出版史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因此为众多研究出版史的学者所认可。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一些学者对弥吉

^① 弥吉光长：《出版史的研究法》，《出版史料》，1988 年第 1 期。

光长的观点提出了重要的补充意见,形成了更为完整和成熟的理论,其中以肖东发、袁逸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他们认为,中国出版史是编辑出版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中国历史上的出版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史,其研究范围主要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出版事业内部诸方面的联系;其二是出版事业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与影响。具体来说,其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层面:研究出版事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过程;研究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出版家、出版机构在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方面的业绩;研究历史上重要出版物的内容、类型、品质、数量及其所标志的出版阶段;研究各时期出版事业的不同外部条件、不同特点及不同成果。举凡文字的产生、图书的起源、编辑的萌芽、出版业的形成、著名出版家的业绩,图书的编纂著述、整理校勘、抄写印刷、装帧设计、形式制度、贸易发行,典籍保护、流通利用以及各朝代的编纂刻书机构、组织管理、法规制度、出版业的优良传统、经验教训等都是出版史的研究课题。在史料搜集、史事考证的基础上,探究编辑出版在社会历史文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揭示出版事业发生、发展的机制和规律,是该学科的研究任务。出版史可划分若干专门史,按出版物类型分,则有图书史、报刊史、版画史等;按出版程序分,则有编辑史、印刷史、装帧史、发行史等;按出版时代或出版地域分,则分别有出版通史、断代出版史、地域出版史等;此外,翻译史、稿酬史、著作权史等也是出版史研究中不可割裂的有机组成^①。这个观点已经把出版史的定义、范围、作用以及划分叙述的一清二楚,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① 肖东发、袁逸:《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根据以上定义,结合本课题资料的特点,笔者决定本研究主要以图书为研究对象,报刊暂不列入研究范围,下面分门别类地对相关学术史予以回顾。

(一) 关于图书史的研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以对中国图书及雕版印刷的探本溯源取代了中国出版史的研究。目前流传的几种出版史专著仍未摆脱图书史和印刷史研究的窠臼。其实图书史只是出版史中的一门专史,而不是全部。但鉴于图书史与出版史的关系非常密切且与本研究有一定关联,因此有必要加以梳理。

中国图书史研究的创始人是叶昌炽。1897年,他著成《藏书纪事诗》,记述了自五代到清末739位藏书家的事迹,其体例是“领以绝句,缀以事迹,必要时殿以案语”,被公认为中国图书史开山发凡之作^①。继叶昌炽之后,清末的叶德辉是对中国图书史研究有巨大贡献的一位学者。他用笔记体记载了我国古代图书的历史知识和出版印刷史料,包括雕版源流,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宋、金、元、明、清断代刻书,以及古代抄本、藏书、书业、书价、版片名称、古籍辨伪等知识,初步确立了中国图书史的学科体系,堪称中国图书史和版本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②。总体来说,晚清还处于出版史研究的萌芽阶段,尚显浮浅,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两书都是将出版史蕴藏于图书史之中,而并非出版专史。

民国肇始,学者们对图书史的研究不辍。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详细考证了雕版印刷的起源与发展概况,成为较早系统讲述中国图书史的研究著作^③。陈彬和、查猛济合著的《中国书史》,则是

① (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② 叶德辉:《书林余话》,岳麓书社1994年版。

③ 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

第一部以“书史”命名的通史性著作。该书有条理地按照朝代以及书籍制度介绍了中国图书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对宋、元、明三代的刻书事业叙述较为详细,附录有大量刻本史料,构筑了中国图书史的研究框架,但缺点是阐论不多^①。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注重考察古今典籍聚散,该书以立论为重,以史料为主,经纬分明,系统翔实,是一部史论结合的图书聚散史专著^②。纵观民国的这些研究,明显带有“初创”的特点,表现为出版史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范围都不明确。从研究成果的内容上分析,多偏重于图书印刷史和收藏史,研究领域十分有限,而且显得零散。由于受清代考据之风的影响,论著过于注重考据,缺乏理论深度。

新中国成立后所出之图书史著作堆砌史料的状况有所改变。其中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研究卓有成就,他提出了以历史发展为背景的中国图书发展史的体系,试图从图书的思想内容、物质形态和社会作用三个方面全面地、辩证地阐述中国图书的产生、发展及其社会作用,其著作颇有影响^③。随后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由于政治因素研究陷于停顿,而海外和港台则硕果累累^④。“文化大革命”后,大陆学术界恢复了对图书史的研究。80年代,郑如斯和肖东发编纂《中国书史》一书,系统阐述了从古至今中国图书史的发展过程及规律,收入了较多的新观点和新材料^⑤。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一书,则颇有创意地把图书和图书馆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注

① 陈彬和、查猛济:《中国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②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③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④ 详情参见以下各书——(美)钱存训:《中国古代书史》,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高越天:《中国书纲》,台北维新书局1971年版;蒋复璁:《中国书籍考论集》,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2年版;李文琦:《中国书籍演变论集》,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2年版;乔衍琯、张锦郎:《图书印刷发展史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75年版。

⑤ 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去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的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书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①。国家图书馆的李致忠先生也一直致力于图书史的研究,著成《历代刻书考述》一书,概述了唐宋以来历代刻书的时代背景、刻书机构以及特征,新意颇多^②。2001年,肖东发先生出版了新作《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有颇多创新之处,譬如用实物和文献相结合的方法,说明套版印刷包括短版技术起源于宋代,拱花技术肇始于唐代;另外还突破以往只讲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的成说,对发明印刷术作出重要贡献的佛教寺院刻书、与教育密切相关的书院刻书,也列出专章加以叙述和论证^③。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图书史的研究取得的成果非常丰富,新的领域不断开拓,学者们注重探讨出版活动的一些规律,研究层次逐步加深,并纠正了一些人们传之已久的错误成见。但图书史毕竟不等同于出版史,因此,以上列举的研究成果,范围略显狭窄;而且对古代出版史研究得多,对近现代出版的研究尚显薄弱。

(二) 关于出版史的研究

中国最早以“出版史”命名的著作是1946年杨寿清著成的《中国出版界简史》一书。该书将中国出版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古代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为“渐进阶段”;(2)1919年“五四运动”至1932年“一·二八”前为“飞跃阶段”;(3)1932年“一·二八”后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为“波动转向阶段”;(4)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离乱阶段”。该书不到4万字,虽然篇幅不大,但粗略地勾勒了中国出版从古代到抗日战争期间发展的历程,开

① 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版。

③ 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